

战国写本兵书——《曹沫之陈》

田旭东 Tian xu dong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有一部《曹沫之陈》^[1]，是一部失传已久的鲁国兵书，在历代目录书的著录中，在传世和出土的古代兵书中，从未见到过鲁兵书，而且这是一部目前所见唯一的一部战国写本兵书，它的出现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先秦兵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曹沫之陈》全书共65支简，大约1700多字，文体系鲁庄公与曹沫的问答，以鲁庄公提问曹沫回答的形式体现出曹沫的军事思想，属于先秦时期流行的文体。据整理者李零先生说，简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政，后一部分论兵^[2]其实在后一部分论及两军对阵的具体应对措施时，也有一些属于论政的内容，这也应该是古代兵书常见的特征。

“论政”的内容涉及到“为和于邦”、“为和于豫”^[3]、“为和于阵”以及“为亲”、“为和”、“为义”等，谈论的主要是如何“治国”或如何“治军”的问题，显然属于治国用兵之术中的“治国安邦之策”，或为“建国方略”、“建军方略”，此类内容在古代兵书中常见，尚未涉及具体的行军用兵之法。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一部分内容，仅就后一部分论兵的内容、曹沫其人以及该书的价值等作一些讨论。

—

先看其“论兵”的内容。由于多支简残断，《曹沫之陈》“论兵”的内容比较有限，并非完整的长篇大论，不如“论政”的内容篇幅长而且语句也较为完整，但我们从中仍可找出属于古代兵家的一般论述：

首先论及“战有显道”，曰“毋兵以克”。具体的解释为：“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以兵器、装备以及指挥人员等各方面均高出对方一筹的态势进行威慑，迫使对方就范，与《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出一辙，^[4]此乃用兵的最高境界。

其次，当鲁庄公问及“出师有忌乎？”时，曹沫连答“四忌”，即“出师之忌”、“散裹之忌”、“战忌”、“既战之忌”，颇为精彩。具体是：“三军出乎境必胜，可以有治邦，……其将卑，父兄不薦，由邦御之，此出师之忌”；“三军未成阵，未舍，行阪济障，此散果之忌”；“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附，其启节不疾，此战之忌。是故疑阵败，疑战死”；“其赏浅且不中，其诛厚且不察，死者弗收，伤者弗问，既战而有殆心，此既战之忌”。具体指出师在外而受国君遥控；未成阵而遭敌击；缺乏果断，犹豫不决，丧失有利战

机；战后赏罚无当，不恤死伤等，凡此种种向来是兵家之大忌。这类问题几乎在古代兵书中或从正面或从反面都有论及，而应属《曹沫之陈》提出较早也最为集中。比如关于“出师之忌”，《司马法》有“阃外之事将军裁之”^[5]，后世多有“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6]语，这实际上是古军礼内容之一。关于“散裹之忌”，《吴子·料敌》以敌方“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为可以与之决战的八种情况之一，足见后世兵家均以“半渡而击”、“未阵而击”为大利。对于“战之忌”之“疑阵败，疑战死”，更多见兵家论述，《孙子兵法》主张“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7]自不待言，《吴子》《治兵》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论将》曰：“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尉繚子·勒卒令》曰：“夫蚤决先敌，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六韬·龙韬·军势》则有：“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害，莫过狐疑。”可见果断的军事决策备受兵家重视。对于“既战之忌”，《司马法》《天子之义》有：“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严位》有：“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

罚。”《尉繚子·战威》有“赏禄不厚，则民不劝”，“刑赏不中，则民不畏”，都是讲战后赏罚要及时、得当，以利调动军队士气的意思。“明赏罚”、“信赏罚”之语在古代兵书中出现频率极高，应该看作是最为突出的古代治军传统。

再次，《曹沫之陈》“论兵”的内容比较完整而又系统的，还有所谓的“复败战之道”、“复盘战之道”、“复甘战之道”、“复故战之道”，此四者，由于存在断简和一些未释出、文义不明的字，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其详细所指，似有一些吊死扶伤、赏罚有当、战后修整的内容，李零先生认为“都是讲处于不利情况下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应该是对的。

最后，当鲁庄公问及“善攻者奚如”？时，曹沫答曰：“民有保，曰城，曰固，曰阻。三善尽用不弃，邦家以宏。善攻者必以其所有，以攻人之所亡有。”又问“善守者奚如”？答曰：“……所以为毋退。率车以车，率徒以徒，所以同死……”这里由于竹简残缺而文句不全，但大意尚明，所论为战法中的攻守之道，攻必以己之所有而攻敌之所无，且必以坚固而又险要的防御设施作为攻的保障。至于如何守，竹简可读的仅有一句“率车以车，率徒以徒，所以同死”，李零先生认为“所以同死”之下应接“生”字，即“率车则与车同在，率徒则与徒同在”，与之共死生，讲的是坚守之道。

以上摘出的即是《曹沫之陈》

“论兵”的主要内容，可见曹沫的所谓“阵法”即战术指导原则皆不如后世兵书那样论述精当，语言也不够完备、流畅，它所反映的应该正是早期兵书的实际情况。

二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转变过程，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春秋中期前，各国在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也比较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战车的阵地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故在春秋早期的军事领域中，无论是战争观念、战争目的、作战方式，还是战争指导，都表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征，即由早期的“兴甲兵以讨不义”^[8]的正义之举向“伐大国”、“拔其城、蹙其国”^[9]的争霸战争过渡；由早期“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10]的恪守“军礼”向“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1]的奉行“诡道”过渡。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军事领域丰富多彩的、充满着各种矛盾的历史阶段。

我们从发生在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例就可看到这种充满矛盾的过渡性质。那时的军事活动，既有战场上的残酷厮杀，又更多地具有以迫使敌方屈服为目的的“行成”、会盟等比较温和的行为。考察齐桓公称霸的过程，我们看到真正通过激烈的战场之争的情况实际上并不多，基本上都是依靠军事上的威慑作用，以使诸侯顺服，达到

建立霸业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果考察当时战场上的正式交锋，还可看到一些军礼原则的指导作用，《司马法·仁本》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在宋楚泓之战中即有宋襄公恪守古军礼：“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12]不肯乘楚军半渡、未成列之机发起进攻，而最终被楚军所败的结局。宋襄公之举在后人看来愚蠢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依军礼行事。

曹沫为鲁庄公时期人，鲁庄公于公元前693年—公元前661年在位，共32年，正值春秋早期，齐桓公争霸即在这一时期。终春秋一世，鲁国一直处于二等国的地位，其军事实力及整个综合国力均不能与其近邻齐国相比，而就《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来看，鲁庄公时期还可称得上是比较强大、在诸侯国中占有比较重要位置的时期，据《春秋》与《左传》记载，这一时期是鲁国参与诸国军事活动与会盟活动最多的时期。

从《春秋》与《左传》的记载，可以了解鲁庄公时期鲁国所参与的军事及会盟活动大约有28次，其中属于鲁国单独的军事活动较少，多是对一些小国的侵伐，如伐余丘、伐卫、败宋、追戎、伐戎等，大多情况下是参与其它国共同的军事活动，尤其在鲁庄公十五年

齐桓公称霸之后，鲁国基本上是“会齐”而伐某国，完全听任霸主的调遣，几乎再不见其有独立的军事活动。齐桓公称霸之前，鲁尚与齐有过几次军事冲突，甚至有“长勺之战”成功逐齐的战绩。“长勺之战”前，由于鲁与齐两国长期的恩怨，双方多有争斗，当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时，鲁国还有以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并派管仲射杀公子小白之举，^[13]可见当时鲁国的实力并不低于齐国多少。然而当齐桓公上台，齐国兴起并走上称霸之路以后，鲁国的情景则是每况愈下，无法与齐国相抗衡，只有依附于齐国了。

曹沫正是一位出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自身也充满着矛盾的传奇式人物。

史书对曹沫的记载，见于《左传》、《谷梁传》、《国语·鲁语》、《管子·大匡》及《史记》之《鲁世家》、《齐世家》和《刺客列传》等多种，其名字也于诸书中写法不同^[14]，但历史上比较常用的是“曹沫”或“曹刿”。诸书对曹沫记载比较集中的有两处，一是《左传》庄公十年所记“长勺之战”，庄公用曹沫之谋，待齐军三鼓而气竭时向齐军发起进攻，成功地挫败齐国的侵伐；一是《史记》《刺客列传》和《齐世家》记载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齐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记载俨

然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是足智多谋、沉着应战并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一个是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来广为人们所称道的匹夫之勇、刺客，后世之人很难把“一人敌”的勇者与“万人敌”的军事家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恰恰就是一人^[15]。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还记有曹沫的另一事迹：“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材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国语·鲁语上》亦记此事，后有“公不听，遂如齐”。社，齐祀社神，搜军实以示军容。曹刿认为鲁庄公前往观看不合礼制，指出：“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16]并警告庄公以这种不合法度的行为载之史册何以向后人交待。这又使我们看到曹沫的另一面，他如此熟悉礼制法度，至少是一位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教育的贵族，如按《左传》庄公十年记“长勺之战”前，“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观之，他又是一位社会地位比较低贱的人，若算是贵族也只能归入下层贵族一类。这样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且以国家之兴亡为己任，谙熟礼制、足智多谋、而又具匹夫之勇的人，或许正是兵书作者的最佳人选。

然而，限于曹沫所处的历史时

代，限于鲁国当时的国力以及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地位，还限于鲁国的学术传统和氛围，曹沫只能写出一部带有过渡性质的兵书——《曹沫之陈》。

春秋中期以后，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相应进入新的阶段。当时战争的发起者和指导者，开始摒弃旧礼制的束缚，使战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况。战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方式的变化和作战指导的进步。春秋晚期以后，激烈的野战开始盛行，战争的范围由过去的中原地区向偏远地区延伸，战争往往带有持久长期的性质，进攻方式也开始带有运动性了。以公元前506年的吴楚柏举之战为例，吴军避敌正面、迂回奔袭的战略和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突袭破阵、纵深追击等战术，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崭新气象，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体现在春秋晚期以后战争上最大的特点，当属作战指导的根本性变化。这就是“诡诈”的战法原则在军事活动领域内的普遍流行，过去的那种“贵偏战贱诈战”^[17]的堂堂之阵战法遭到全面否定。正如班固所概括的：“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8]可见社会对当时兵家所提出的要求，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构建新的军事理论，用以更好地指导战争。这预示着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已经面临着新的契机、新的转折，而这种转折，就是由“军法”（或曰“军礼”）向

“兵法”（或曰“战争艺术”）的转折，它以孙武的出现和《孙子兵法》的面世为最主要的标志，而《曹沫之陈》正是兵家由早期的恪守古军礼的“仁道”向“兵不厌诈”的“诡道”之间的过渡。

三

据《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兵家著作有出自齐国者、有出自魏国者、有出自赵国者、有出自燕国、晋国、秦国、吴国、越国、楚国者，而唯独不见著录有出自鲁国者，不限于《兵书略》，见于其它各略与兵书有关的典籍全部钩稽而来，也与鲁国无缘。这一事实给人的印象是鲁国没有兵学传统，也未产生过军事家。的确，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认为鲁国的学术背景以正统周礼为主，突出对西周文化的继承。《曹沫之陈》的出土，至少可以使我们对先秦文化获得新的认识，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各国文化既有各自突出的特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多样性，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化风格显现出的复杂性，过去那种一味认为鲁国不具备军事传统，仅传承周文化，儒学发达的看法，应重新加以认识。

《汉志》和其它典籍不见著录和记载的事实，还说明《曹沫之陈》至少在西汉时期已经失传，那么，失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作为考古新发现，还作为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战国写本兵书，又作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唯一一部鲁国兵书，《曹沫之陈》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但就其内容来看，实事求是地说，它的确明显表现出其粗浅而不成熟的“过渡”性质，无法与后来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尉繚子》、《六韬》等相比，其思想性理论性均有较大差距，这大概是其失传的根本原因。兵书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是要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战国时期，如《韩非子·五蠹》所说“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书者家有之”，是因为其有用，设想一部兵书如果没有人去用它，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就难免遭到淘汰的命运了，《曹沫之陈》的失传大约正是如此。

（田旭东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 教授）

注释：

[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所依《曹沫之陈》均见于此，文中所引内容中的部分字按释读后应读的字写出，未依原文。

[2] 李零：《曹沫之陈》释文说明，又见《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3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3] 豫，李零先生释文说：“从文义看，似与‘陣’相似而有别，‘陣’释临战状态下的固定阵形，而‘豫’则是趋战过程中临时采取的队形。‘豫’在‘陣’前，还没有形成‘陣’。”而陈剑、白于蓝等先生均“豫”为“舍”，（陈、白之说均于“简帛研究网”）从前文看，“舍”似更妥。

[4] 李零先生言：“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笔者十分赞

成。

[5] 《司马法》逸文，《春秋公羊传》襄公十九年疏引。

[6] 《史记》之《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记司马穰苴、孙武事迹时均有此言。

[7] 《孙子兵法·九地》。

[8] 《司马法·仁本》。

[9] 《孙子兵法·九地》。

[10] [11] [18]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12]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3] 《史记·齐太公世家》。

[14] 具体见李零先生释文前之“说明”。

[15] 李零先生于《读书》2004年第9期发表有：《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为读者释疑，兼谈兵法与刺客的关系》一文，考证详审，论述精采，请参阅。

[16] 《国语·鲁语上》。

[17] 偏战：《公羊传》曰：“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责任编辑 范培松）